

目 录

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慰问同盟国和出席

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内幕……强俄巴·多吉欧珠 (1)

“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真相

……………桑颇·单增顿珠
贡 噶 坚 赞 (12)

劝阻假班禅出国记……………王 贵 (19)

拉萨英语学校破产记……………嘎雪·曲吉尼玛
拉鲁·次旺多吉 (27)

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黄慕松来藏致祭

十三世达赖喇嘛片段……………色新·洛桑顿珠 (35)

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片段

……………夏扎·甘登班久 (40)

回忆我的父亲——龙夏·多吉次杰…拉鲁·次旺多吉 (46)

我当过监禁前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狱卒

……………夏尔孜·益西土丹 (53)

回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强巴

……………帕苏·土登曲杰 遗作 (62)

我的家乡——门隅……………益西赤列 (67)

忆修建当雄机场……………嘎雪·曲吉尼玛 (81)

十八军进藏纪实……………张国华 遗作 (87)

回忆进藏初期的一次访问活动……………阴法唐 (104)

我被劫持去印度的前后……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 (115)

附录：征稿启事

第一辑汉文版重要更正

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慰 问同盟国和出席南 京国民代表大会”内幕

强俄巴·多吉欧珠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客观事实，是被浩瀚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资料所充分证明了的。但是，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染指和挑唆，西藏上层人物中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背离广大藏族人民的意愿，倒行逆施，炮制了一幕幕“西藏独立”的拙劣丑剧。一九四五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慰问同盟国和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仅就个人的耳闻目睹，将其活动的始末追述于后。

使命自相矛盾的代表团

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世界上所有被侵略、被奴役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相互配合，共同战斗，粉碎了德意日妄图吞并世界的迷梦。人类历史上空前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发动这场战争的德意日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当时，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由摄政王达扎·阿

旺松热以及四个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索康·旺清格来、平康·扎西多吉、嘎雪·曲杰尼玛组成）为实现其“西藏独立”的阴谋，急急忙忙利用这个时机，拚凑了一个所谓慰问“同盟国代表团”，拟赴“汉”、英、美三国进行活动。

“代表团”的团长是札萨喇嘛绒伯伦·土登桑培，副团长札萨凯墨·索朗旺堆。成员有：凯墨·次旺顿珠（四品官）、翻译员益西达杰和我本人（五品官）。

大家都清楚，噶厦政府——隶属于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根本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派出一个代表团进行“慰问同盟国”的国际活动。然而，噶厦政府擅自派出代表团，是经历了处心积虑策划的。首先，他们出面慰问“同盟国”，这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他们在向世界宣布：他们不属于同盟国范围，而是独立于“汉政府”之外的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这显然是搞“西藏独立”的一个大阴谋；其次，噶厦政府常用一切国际场合和世界上有名望的人物来为他们的分裂活动争取舆论支持，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再者，通过这次的游说活动，向美英帝国主义乞求援助，来为他们的“独立”活动做好物资和军事上的准备。这是他们此举的罪恶目的所在。

正当西藏地方政府积极筹备慰问“盟国”事宜之际，国民党南京政府又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处长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出席，并转达国民党政府的通知说：“此次西藏代表前去参加大会，可以提出各种要求，政府将尽力予以解决。”西藏地方政府认为，既然有国民党的这种“允诺”，就有机可乘。于是决定在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的基础上再增加人数，以作为同时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新增加的五个人是：卸任达赖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曾諄·土丹参列、新任处长堪穷·土丹桑布、曾諄·土丹次旦、翻译员土丹桑格以及强巴阿

旺。这个代表团授命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扩大西藏地域和权力的要求。为此目的，西藏地方政府专门召开了代表会议，拟订了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为了保密，报告不由代表团随身携带，而是责成昌都总管派专人（德格·格桑旺堆）去南京直接交给“代表团”。

“代表团”的任务是：先到印度向英、美政府表示慰问，然后去南京向国民党表示慰问，同时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并将盖有噶厦、三大寺四个印章的“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会议”报告书呈交国民党政府，再通过广泛的私人活动，力争批准。

一九四六年（藏历木鸡年）年初，“代表团”启程前夕，去噶厦拜别时，首席噶伦喇嘛然巴·土登贡钦训示：“你们肩负的担子很重，对外只能说是去慰问汉、英、美同盟国的胜利，对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和全藏会议报告书等事项一定要严守机密。每个团员一定要服从团长的指挥，不得擅自行动。”接着，令其他人员退下，留两位团长另做了详细布置。

这样，一面想竭力表白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同时又以地方政府身份去参加国民党中央政府制宪会议的这个使命自相矛盾的“代表团”，经过一伙蠢材们苦心策划和密谋后，粉墨登场了。

慰问盟国活动

一九四六年元月底的一天早上，“代表团”正式成员八人，乘骑出发，经过三个星期到达锡金首府岗托。锡金国王和英国驻锡金总督霍根森视我们为“贵宾”，在正式接见后，还举行了丰盛的宴会，热情接待了我们。并指派了曾到过西藏的锡金人热耶巴都·索朗多丹（英驻藏代办处处长，曾被西藏地方政府授予四品官）和巴布扎西二人当我们的向导和翻译。后，霍根森还亲自陪同我们经加尔各答到达新德里，印度政府在车站上举行了隆重

的欢迎仪式。“代表团”在新德里逗留了两个星期，霍根森一直陪同我们。

当时，印度是英属殖民地。英驻印度总督维瓦和夫人接见了我们。“代表团”向他们转交了达赖和摄政王达扎的信件，并敬献了礼品，其中有绣了佛像的画轴，还有银质器皿和西藏地毯等。交谈结束后，总督和夫人在宫廷的花园里与我们合影留念，并设宴招待。这就是所谓对英国政府表示慰问的情况。

对美国政府表示慰问的仪式是在新德里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内进行的。代表团拜见了美国大使，转交了达赖和摄政王达扎的信件及达赖的照片，说了一些奉承美国政府的话。仪式完毕，大使馆设宴招待，宴会后放映了电影。

此时，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处长沈宗濂也正途经新德里返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他有时也到“代表团”下榻处探望我们。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馆也曾设宴招待“代表团”。

在新德里的两个星期，我们应印度政府的邀请，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战胜国举行的庆祝胜利的活动。如阅兵式、军事表演、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死难烈士大会等。还参观了一些厂矿、学校，游览了一些风景区。

英国驻印度总督对我们前去南京慰问国民党政府之事虽亦有所知，并未明显表态；但对我们前去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则明显地表示不满，却又找不到借口公开阻拦。他们在绞尽脑汁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拦阻我们的“绝妙”理由，这个理由也只有最“高明”的阴谋家才想得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瓦热那斯城的气候十分酷热、潮湿，加之毒蚊成灾，土丹次旦、强巴阿旺和我以及其他几个人浑身生了痱子。热耶巴都·索朗多丹假惺惺地为我们请来了“医生”，说我们患了传染病，必须速返加尔各答治疗，如拖延时间，其后果是严

重的，他们不能负责。这样，代表团成员在瓦热那斯城便分成了两部分：札萨凯墨·索朗旺堆、土丹桑布、次旺顿珠和两位翻译按原来的安排去孟买游览；其他成员前往加尔各答治病。在加尔各答，霍根森又假情假意地陪同我们去医院就诊，他先和医生咬了一阵耳朵，然后医生说了一些吓唬我们的话。返回驻地时，霍根森又故弄玄虚地说：“你们得的是一种极危险的传染病，不能在热带地方住下去，如果继续留在加尔各答，警察会把你们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你们还是回岗托，那里的气候较凉快，又是我的辖区，条件也很好。”我们是初到印度，既摸不清热带气候的特点，又对自己所患的“传染病”疑惑不解，怀着恐惧的心情询问久居加尔各答的两个藏人和一位汉族名医，始知从寒冷地方到热带地方的人，每逢夏季都要长些痱子，并非什么传染病，我们这才放了心。我们向霍根森表示：我们不回岗托，警察局要抓就抓吧！霍根森又让札萨·土丹桑培动员我们，还是老调重弹，说我们患的确实是传染病，不宜在此久留，回岗托有好处等等。我说：“我们长的是痱子，不是传染病。”霍根森还用嘲弄的口吻说：“你是医生？”并气势汹汹地说：“‘格日则思真’是接待外宾的旅馆，你们这些患了传染病的人住在这里，人家会嘲笑我，影响我的声誉，你们一定要回岗托！”再次向我们施加压力，阻挠我们前往南京。

为了摆脱霍根森的干扰，土丹桑培派翻译员益西达杰找国民党驻藏办事处沈宗瀚处长，请求支持。经联系，他帮助我们搬到了国民党政府驻加尔各答的领事馆。霍根森、热耶巴都·索朗多丹企图阻拦我们去南京的阴谋失败，对我们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伪国大表示了格外的热情。使馆人员说：“你们去南京，亲友、佣人都可以陪同去。”于是，代表团增加了札萨凯墨·索朗旺堆的夫人德央和英语翻

译桑都·仁青、秘书巴拉·旺久。当时，达赖的哥哥嘉洛顿珠和达赖的姐夫平措扎西也在加尔各答。后来，始知他们也是前往南京的。

四月四日，代表团成员及随行人员和嘉洛顿珠、平措扎西等一行近三十人，在沈宗瀚处长的陪同下，乘飞机经昆明前往南京。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有达赖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曾諄·土丹参列、翻译员土丹桑格和蒙藏委员会的一些官员。我们下榻于市北面鼓楼附近的一座大院里。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位曾在西藏多年名叫益西巴珍的汉族女士做我们的翻译。

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忙于由重庆迁往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先生最先抵达南京，他接见并设宴招待了我们。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到达南京。“代表团”正式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慰问和祝贺胜利的仪式是在总统府礼堂举行的。那天上午，先将噶厦政府赠送给蒋介石的锦缎画轴、藏式银盖、银座、玉器、西藏地毯以及代表团成员个人的礼物陈列好，然后以两位团长为首的十个成员依职位高低排列等候。少许，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陪蒋介石来到主席台，高呼三鞠躬后，蒋介石点头还礼。然后把我们引到接待室进行交谈。他谈话的内容大都是炫耀国民党的武力如何强大，以及他的母亲也是佛教徒等等。中午，蒋介石及其夫人陪同我们在励志社共进午餐。除代表团的十三人外，还有嘉洛顿珠、平措扎西。饭后，合影留念。至此，所谓慰问“同盟国”的活动全部结束。

以上事实说明，西藏地方政府虽然摆出一付“独立国”的架式，擅自派“代表团”前去慰问“同盟国”，进行了一次非法的外交活动，但却未得到国际上的正式承认。就连从新德里去南京的护照，也是南京政府签证的。事实证明，西藏地方政府无权签发护照，签发了也无任何效力。

出席“国民代表大会”

“国民代表大会”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是：札萨僧俗官员五人、达赖驻南京办事处新任官员三人和原办事处官员二人，共十人；班禅堪厅的代表是：仲且·诺云、计晋美、拉敏·益西楚臣、次仁顿珠、何巴敦、宋志书；甘南藏族代表中还有黄振清；青海的代表格西·西饶嘉措；西康达吾寺的代表莫乌群则等。西藏代表团团长土丹桑培被安排到主席台上就座。整个会议期间，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严守西藏地方政府规定的戒律。为请示工作，两次给西藏地方政府拍了电报。西藏地方政府电示：会场上不要鼓掌；对决议进行表决时，不要举手；在决议内容里，力争不写关于西藏的事宜。根据惯例，代表团的行动均由团长议决，如今两位团长也茫无所措，进退维谷。在既要参加会议，又不能表态的情况下，团长常常找我们团员商量决定一些事情。

会议进行表决时，不是举手表决的，而是在主席台上安置了显示灯，灯泡的排列与座位相同，每个代表的椅子上都有一个开关。按规定，对表决的议案凡是同意者就拉开关。但是，腐败没落的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也不敢实行真正的民主的。他们在用于表决的显示灯上搞了一个骗局，不论同意与否，拉与不拉开关，台上的灯泡都始终是亮着的。因我当时年纪较小，对周围的一切颇感新鲜，我好奇地按了一下开关，台上的显示灯没有任何变化，连按几下，依然如故。这才使我明白，那完全是一套虚伪的东西。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无意中告诉了其他成员，还遭到了团长的训斥。

在分组讨论时，西藏、内蒙、新疆是一个小组，组长是白崇禧。在对宪法逐条进行讨论时，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指令我们不得

表态，所以我们一直持沉默态度。宪法中有一条是关于西藏、内蒙实行自治的问题，会上我们也未敢发表意见。散会后，我们回到驻地，立即商量“对策”，决定直接向白崇禧陈述“宪法中不能写进西藏问题的意见”。白答复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就象一个大公司。有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大家都是这个大公司的主人。我们是五族共和，这样写没有关系。”我们对此再没有提出异议。

整个会议期间，我们的思想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会议将要结束时，我们以为还要在文件上搞什么签字等活动，又发电报请示西藏地方政府。复电说：如要签字，你们就巧妙地避开为宜。为了回避签字手续，两位团长和翻译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前后去上海作了七天的游览。其实，在会议结束时，并没有搞什么签字那一类名堂。

从形式上看，“国民代表大会”好象给国民以民主的权力，实际上与会者尽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连他们本身在独裁专制的国民党统治下，也难有各抒己见的权利。例如，在决定首都地址时，虽然多数人提出定都北京为宜，但是，大会主席团却置多数代表的议论于不顾，而宣布南京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一个代表愤怒地上台质问，话音未落，就被工作人员推下台去。蒋介石也出场了，他不但不接受意见，反而将这位代表训斥了一顿。这哪有一点民主的气息呢？！至于代表们对议案条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大会主席团一概置若罔闻。全部决议，都是蒋家王朝的私货，所谓民主讨论、民主表决，完全是欺骗舆论、欺骗人民，“国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表决机器而已。

“报告书”石沉大海

西藏地方政府责成昌都总管派专人送往南京的“西藏民众大

会”给“国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书，其内容本来只能是两位札萨团长知道。可是，在戴学廉和刘秘书翻译时，被我看到了。报告的内容大体是：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是施主与受施者的关系。汉、藏的语言、文字、服饰、风俗、习惯都各不相同，长江上游康定以西的地方都要划归西藏，在选认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时，中央政府不得干涉等等。这是妄图从语言、文字和服饰、习俗的差异上来说明西藏不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进而割断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最后想要达到“独立”的目的。只不过没有公开提出罢了。

报告书交由蒙藏委员会转呈国民党中央政府，事过半年没有音讯。我们数次询问国民党政府，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政府已成立了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为首的小组，专门调查解决此事。”期间，代表团的两位团长指派翻译员土丹格桑在南京购买了相当数量的金条、金镯，企图通过行贿手段，促成报告能获得批准。国民党政府不会同意西藏政府的要求，但又基于客观原因不宜明说，只好采取拖延搪塞的办法，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要西藏地方政府派权力最高人物前来协商。”代表团也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南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如以后能在拉萨协商，客观条件有利于西藏地方政府，或许能有所进展。为此，向地方政府发电报请示，复电同意以后再说。这份蓄谋已久、包藏祸心的“西藏民众代表大会”报告书，最后仅仅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一纸收据。

在上海等地游览

“国民代表大会”未能按期闭幕，国民党政府便安排我们到上海等地参观游览。五月底，在沈宗瀚处长陪同下，代表团大部份成员和嘉洛顿珠、平措扎西等一行去上海、杭州等地参观游览。这些地方的许多名胜古迹多已毁于战火，尚未修复。

我们参观了化肥厂、火柴厂、汽车修配厂等一些小型工厂和部份寺院。寺院也是破败不堪，稍好一些的寺院大都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兵营。这一切与“国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看看：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工厂、商店、银行纷纷倒闭，到处是一片骚动，民不聊生的惨状。

回到南京时，副团长凯墨·索朗旺堆的夫人德央不幸病故，索朗旺堆也已返回昌都。其他人拟去北京避暑，又因铁路不通，只能乘坐飞机。但飞机性能差，飞行员技术不过硬，加之飞机事故时有所闻，我们不敢乘坐，可又苦于南京的酷热气候。无奈何，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乘机前往北京。

当时，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全国人民掀起了制止内战的浪潮。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示威、请愿等活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已指日可待。

国民党政府对待少数民族是极其轻视的，对这次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的招待也很冷淡。在南京开会期间，只给两名团长安排了一辆普通的军用小吉普外，其他人员只派了一辆中吉普。去上海游览时，将我们安排在简陋的金山饭店，那里有时连饭也吃不上。在北京时，安排我们在北池子附近的一家极普通的饭店里住宿。返藏前，只发给我们勉强够用的路费和以送礼为名的一点微薄钱物。更使人气愤的是，一家报纸竟登了这样一条新闻：西藏代表札萨凯墨·索朗旺堆的夫人德央在饭店里进餐时，竟把掉在桌子上的点心渣用舌头舐着吃了。此外，在公开出版的一本书中还这样写道：“……所有的藏族俗人都患有梅毒病，而淋病则更是普遍的。”对藏族人民极尽歧视污蔑之能事。

我们在南京住了一年多之后返藏。行前，蒋介石接见了我们。他要我们将回信和绸缎、陶瓷、餐具等礼品，分别转给达赖和摄政王达扎。还根据我们每个人职位的高低，分别赠送了绸缎、瓷器等物以资笼络。除新任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堪穷·土丹桑布、曾諄·土丹次旦、翻译员强巴阿旺留在南京住在办事处任职、嘉洛顿珠留在南京继续学习外，其余的人全部返藏。

一九四七年四月初，我们乘飞机经过昆明抵达加尔各答。国民党政府驻印度领事馆的官员前来迎接我们。因为我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违背了英国政府的意愿，所以，英国驻印度总督对我们这次来加尔各答没有任何表示。

回顾当时的情景，尽管西藏地方政府处心积虑地四处兜售“西藏独立”的货色，但客观上却同他们的愿望相反，“代表团”这次在内地的种种活动，正好说明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九四七年三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泛亚洲会议”时，西藏地方政府又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再一次玩弄分裂祖国的阴谋。

当这个“代表团”同我们在加尔各答相遇时，他们中间有人向我们说：“你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所以参加了南京的国民代表大会，而我们认为西藏是独立国家，所以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其实，都是一丘之貉，相互嘲弄一番，更能说明问题。

我们在加尔各答住了半月左右，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底，返回拉萨。

一九八二年七月

（次平 贡羊 郭翠琴合译）

“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真相

桑颇·单增顿珠

贡 噶 坚 赞

一九四七年春（藏历火猪年），以摄政王达扎等分裂主义分子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背着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派出所谓西藏“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又称黄种人会议）。我俩曾是该“代表团”的成员，现将记忆中的主要史实叙述于后。

所谓邀请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的策划者和导演者是谁呢？“西藏代表团”出去后干了些什么呢？

一九四六年，英国驻拉萨的商务代表负责人黎吉生，唆使噶厦政府“外交局”总管索康索巴·旺清次登向噶厦报告说：“即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泛亚洲会议，黎吉生先生已接到邀请西藏代表出席会议的请柬。黎吉生先生说，如果西藏政府这次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就能体现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如今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务必要派出代表出席会议。英国政府也表示将为西藏的独立活动予以各方面的支持。此外，为了预防来自内部等各方面的干挠（这里所指内部和外部，系指西藏人民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派代表团一事，要严格保密。”显然，英帝国主义妄图利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的政治形势，扶持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势力，策划“西藏独立”，进而染指西藏。

噶厦立即将黎吉生的意思，呈报给了摄政王达扎。达扎——这个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头子，闻此大喜，立即同意派“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随即，噶厦秘密召开僧俗官员会议，决定任命桑颇·才旺仁增和洛桑旺杰为“代表团”的正副团长，桑颇·单增顿珠、孜仲·贡噶坚赞、嘎雪·顿珠兼翻译、吉普·旺堆诺布（兼翻译）为团员，因“泛亚洲会议”还要讨论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以后又增补了哲蚌寺洛色林札仓的格西·仁增丹巴和甘丹寺夏孜札仓的格西·阿旺班登二人为团员。一九四七年藏历正月初二，噶厦召集正副团长面授机宜，并授命代表团为实现“西藏独立”，会议上要竭力宣传在西藏施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必要性；宣扬自松赞干布到历代达赖喇嘛在西藏执政之历史、西藏文化的发展；说明西藏与印度和“汉区”的边界情况；宣传西藏妇女的权利问题和关于噶厦政府接待外国人来藏问题等。其用意是把自“西姆拉会议”以来，帝国主义勾结西藏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搞“西藏独立”，致使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之间已经很紧张的关系继续下去，并企图通过这次会议进而制造舆论，扩大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达到最后分裂祖国的目的。

“代表团”还带了达赖喇嘛、摄政王达扎的照片、信函和黄金、地毯、氍毹等贵重礼品，准备分别送给这次会议主席尼赫鲁、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沙尔加尼那耶珠夫人（译音），以及会议秘书长阿巴卓德·阿布尔嘎。同时，还为英国驻印度总督、印度外交部长、锡金总督等也准备了礼物。“代表团”为了不走漏风声，准备了三十多匹骡马，派了二十多个侍从，扮做远行经商的模样，于一九四七年，即藏历火猪年元月六日从拉萨出发。

“代表团”启程后，黎吉生又通过“外交局”向摄政王达扎建议：作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国家来说，西藏代表团应该带上一面国旗备用。于是，噶厦又匆忙赶制了一面藏军平时打用

的“雪山狮子”旗，作为西藏“国旗”，派人专程送给了已抵达亚东的“代表团”。不久，黎吉生告知噶厦说：“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得悉噶厦派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发表声明极力反对。现在要向团长发报，令代表团在国民党代表之前赶到新德里，造成即成事实的局面才是。”噶厦再次接受了黎吉生的建议，立即向代表团发出急电。桑颇·才旺仁增团长接电后，即刻率代表团离开了噶伦堡，日夜兼程，五天后到达新德里。印度当局派官员前来欢迎。

到达新德里的第二天清晨，尼赫鲁和沙尔加尼那耶珠夫人亲临西藏“代表团”住处表示慰问。印度各家官方报纸也为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作了别有用心的宣传。

次日，西藏“代表团”拜访了尼赫鲁，递交了达赖喇嘛和摄政王达扎的信件和礼物。会见时，“代表团”向他阐述了西藏的政教情况以及“藏印边界”情况，并竭力表白了为实现西藏的“独立”而奋斗的决心。然而，尼赫鲁在沉思中露出一丝微笑，狡黠地回答说：“这次泛亚洲会议在新德里召开，是印度史上的第一次。这次会议，旨在促进亚洲各国间的接触和了解，不讨论政治和边界纠纷，即使提出这些问题，也讨论不出解决办法。”

过了几天，代表团受到了甘地和英国驻印度总督马温巴顿的接见。接见时，桑颇·才旺仁增面交了达赖喇嘛和摄政王达扎给他二人的信件、照片及礼物。在交谈过程中，甘地直言不讳地说：

“西藏过去一直是拒外国人于门外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可以来西藏吗？”团长立即向他大献殷勤地说：“如果甘地先生来藏，我们西藏政府不仅欢迎，还一定会热情接待……”，甘地说：

“你们关着门是不对的，应该把门打开！”接着，甘地又摆出一付伪善面孔，振振有词地说：“印度在没有佛教以前，就已经有了印度教，释迦牟尼根据印度教创立了佛教。这两个教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根子是一个。”言外之意，西藏和印度都是同一

佛祖的信徒，西藏应为印度的进入大开方便之门。看来，这次印度邀请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其居心何在是很清楚的了。

出席“泛亚洲会议”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抵达新德里后，立即向印度外交部和会议组织者提出交涉，指出：“西藏是我中华民国之领土，地方政府无权派遣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印度政府难道连这一起码的知识都不懂吗？此次印度方面擅签入境证件予西藏地方人员，为国际惯例所不容。西藏所派代表可容归入我代表团参加会议，否则我政府代表将抵制此次会议。”对此，印度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印度官方报上表白说：“关于邀请西藏人参加泛亚洲会议一事，乃系印度世界福利会的领袖贾瓦拉·尼赫鲁以私人名义邀请有关代表参加的。旨在促进亚洲各地区的工业、文教、宗教等事业的发展，没有邀请官方代表。正如会议同时邀请俄国六七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而没有邀请官方代表一样。”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对印度当局所作的上述搪塞敷衍的解释，未作进一步的交涉，默认了即成的事实，最后不了了之。

这次会议共开了十天。三月二十三日和最后一天是大会，中间是分组讨论，空余时间就是相互请客送礼，谓之“促进了解”。开幕式由尼赫鲁主持，沙尔加尼那耶珠夫人致开幕词，然后由各代表团致祝词。祝词内容大都是对“泛亚洲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表达了今后各国之间要加强往来，促进各个地区发展的愿望等等。就在这样具有明显离间气氛的会议上，尼赫鲁安排西藏“代表团”团长桑颇·才旺仁增讲了话。其讲话内容是：他对大会邀请西藏“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表示感谢，阐述了西藏和印度早有宗教等诸方面的联系，并强调亚洲各国代表要相互接触、了解，增强友谊。

在这个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们居然把“雪山狮子”旗，同

各国的国旗并列在一起，以示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在三月二十三日大会的主席台上，尼赫鲁安排“西藏代表团”三人，即桑颇·才旺仁增、洛桑旺嘉和翻译吉普·旺堆诺布在各国代表团团长的席位上就坐。更有甚者，主席台墙壁上竟然悬挂了一张将西藏置于中国领土之外的巨幅亚洲地图。对此，国民党中央代表团团长郑彦芬当即向会议组织者提出了抗议，并将三月二十三日大会的情况，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央新闻社记者向国内各家报纸发了专电，消息传开，立即激起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发表言论，表示抗议。后来尼赫鲁向郑团长解释说：“当时尚未察觉，允于今日改正。”随后，对这幅地图进行了更正。此事对尼赫鲁先生的刺激极大，在以后的十余年中，他曾申辩过多次。这里例举两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尼赫鲁先生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尼赫鲁总理在印度人民院的演说中指出：“在以往数百年当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四日，尼赫鲁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说：“我想起当年的一件事，那是用白粉笔画的极其简单的亚洲地图，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西藏和中国交界地段的一些空白处，那张地图是一个艺术家画的，所以无人得知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但是，中国代表即国民党蒋介石元帅的代表，反对那张地图，指出那张地图把西藏从中国划了出去，西藏地方政府是没有资格派出代表团参加这种会议的。”尼赫鲁又说：“我记得后来那段空白处被涂掉了。当然，那是一次文化交流性的会议，不是官方的。”这一切不过是尼赫鲁先生理屈词穷时的自我狡辩而已。

会议在安排讨论时，以农业、工业、文化和福利等问题划分小组。讨论会由各大国轮流担任组长。我们在小组讨论时，有人问到西藏的农业以及有无工业、有无矿产等情况。桑颇团长回答